

一座特殊建筑退出带来的机遇

本报记者 安群英 实习生 汪洋文 陈靖图

郑州市老殡仪馆搬迁了。近日,路过郑密路黄岗寺的市民,转眼顾盼间,都情不自禁的评价这一身边的重大民生新闻。

5月30日,随着几台钩机长臂伸展,老殡仪馆最后一座未拆除的建筑——吊唁大厅被放倒,原址上只剩下围墙内一片平坦的空地。这座矗立在郑州西南出入市口40多年特殊建筑,带着市民的特殊情感记忆退出历史舞台。

郑州殡仪馆的迁建,是政府重视民生倾斜民生的具体体现,新馆的建设将带来更环保的殡葬环境,为市民提供更人性化的优质服务。

郑州殡仪馆的迁建,打开了多年困扰西南部城区发展的一个“死扣”,让西南城区的区位优势、发展空间得以充分伸展。

多个提案迁建殡仪馆

说起郑州殡仪馆的迁建,嵩山路办事处黄岗寺社区主任荆秋生多有感慨,因为与殡仪馆为邻,黄岗寺这三个字,也被赋予特殊含义,成为火葬场的代名词。由于设备比较落后,火化时的烟灰,经常会飘落在他们的院落,老百姓也很少端着碗在外面吃饭,村民自家地里种的菜,也要说是其他村的,才能卖得快。

随着城市的扩张,原来位于城郊的郑州市老殡仪馆紧邻南三环,郑密快速通道经过此处,郑少高速、郑尧高速、环城快速路离此不远,市民或者游客由此进出市区,第一眼看到的就是殡仪馆,冒着黑烟的烟囱,让人心里一沉,有一种别样的感觉。

殡葬产业的发展也需要建设更大规模的新馆。郑州市殡仪馆副主任刘凯介绍,郑州市殡仪馆建于1964年,占地49亩,当时设计的火化能力为每年2000具,随着城市规模的



原郑州市殡仪馆提前拆迁完毕,原址只剩下一片平整的空地。



建成投入使用的郑州市新殡仪馆。

迅速扩大,郑州市的人口总量从当时的100多万人增长到现在的600多万人,现在的火化量平均已达1.2万具,现有的殡仪馆远远不能满足需求。

迁建殡仪馆,成为政府和市民的共同愿望。1994年,郑州市就提出了迁建殡仪馆的设想,随后,历届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也多次提案迁建殡仪馆,但因选址难等原因进展缓慢。

河南省将郑州市殡仪馆迁建列为8511重点项目,郑州市将殡仪馆迁列入为民承诺的十件实事之一。2009年,郑州市正式启动殡仪馆迁建项目,在二七区侯寨乡李村沟的沟壑区选定333亩土地建设新殡仪馆,规模是原有殡仪馆的7倍,计划用3年时间完成整体搬迁。



郑州市殡仪馆原址处于郑州市西南出入市口,地理位置优越,周边商业价值巨大。

上下齐心快速推进

郑州市新的领导班子决定,市殡仪馆迁建工期从原来计划的3年缩短为一年半,2011年6月底前老馆要拆迁完毕,新馆投入使用。市委书记连维良多次实地调研,召开项目推进会,关注项目进展情况。

一定要把郑州市的大项目落实好,把民生工程的好事办好。接到任务的民政系统快速行动,市民政局领导带队,抽调精干人员统筹搬迁事宜,项目所在的二七区同时成立了殡仪馆迁建协调工作指挥部,由区人大常委会主任赵炳林任指挥长,全力配合市民政局做好迁建工作,两级民政系统统筹协调,制定了科学完善的方案。

受传统观念影响,搬迁工作充满曲折。据介绍,在老殡仪馆存放的骨灰大约有3万多个,经过广泛宣传 and 耐心工作,一些家属在规定时间内将亲属的骨灰迁走,但还有近两个无主骨灰盒的搬迁成了难题。

为了确保按时节点完成任务,在有关部门的指导下,二七区殡仪馆迁建协调工作组积极协助主动作为,郑州市殡仪馆在骨灰堂的旁边为其腾出一间房屋,作为工作组临时办公场所,24小时为群众提供服务。吉林长白山市的胡春珍女士,看好“吉时”提出要在早上五点半把骨灰取走,工作组热情接待,这位异

地市民连声称赞“郑州服务”名不虚传。二七区民政局20多名工作组成员克服畏惧心理,不分白天黑夜的工作,用7天时间把近20000个骨灰盒搬到新馆,在脏臭异味的环境中转移123具无名尸体。其间,没有一例群众上访,没有出现一起纠纷。服务小组还为居民办理骨灰盒退费57万余元,没有出现一分钱的差错。项目搬迁期间,仅二七区民政局的干部职工就参加各种义务劳动1500多次。

一方面做好老馆拆迁,一方面抓好新馆建设,争取早日投入使用,两级民政部门的科学部署协调作战,以人文服务和和谐拆迁赢得支持,为项目提前完成争取了时间。去年12月底,老殡仪馆的标志性建筑——骨灰塔及火化烟囱被拆除,今年5月30日,老殡仪馆最后一座未拆除的建筑物——吊唁大厅被放倒,郑州市殡仪馆实现了整体搬迁,比郑州市项目办规定的工期提前了1个月。

殡仪馆顺利搬迁的背后,体现了两级民政部门上下同心的执行力,代表了社会各界发展经济的凝聚力,是落实省委市委“关键在做”的一次生动实践。

一馆迁建 西南城区气象新

“殡仪馆搬走了,企业对这个地段的投资更有信心了”。昨日,亚星地产公司宣传部负责人给记者发来电子邮件,认为这对企业发展和西南部城区经济发展都是个重大利好,由衷感谢社会各界的辛勤劳动。

亚星集团从2003年开始运作其在西南城区的项目,开发第一个地产项目是亚星盛世,现在又积极参与了黄岗寺城中村的改造项目,他们看中的是这里的区位优势、南水北调工程无法复制的环境优势、二七新城的宏伟规划。公司企划部负责人表示,殡仪馆的迁建加快了他们运作项目的速度,公司要建设郑州西南门户的亮点项目。

殡仪馆作为城市公共服务的一部分不可缺少,但是从传统思想和文化习惯来看,所有人又不愿意与殡仪馆做邻居。

“现在开发商的担心

没有了”。二七新城管委会副主任赵阳说,老殡仪馆搬走后,绿城集团、绿地集团知名开发商接洽投资,他透露,前几日还有一家广东商人提出在老馆址建设大楼的设想。

一馆迁建,郑州西南部城区气象新。二七区委书记朱是西站得更高,他认为,殡仪馆的迁建不仅打开了二七新城建设的“死扣”,同时,根据郑州市建设郑州都市区的构想以及提出的十大组团发展规划,郑州市要在西南部城区建设文化生态宜居城,面积在二七新城的范围内增加两倍,殡仪馆的迁建为西南板块的组团大发展扫清了障碍。

临运河、接立交、扼守郑州西南入市门户,老殡仪馆地理位置非常优越,关心郑州发展的各界人士开始了殡仪馆搬迁后的畅想。目前对这块地使用方面的初步意向是:建一座高层地标性建筑,其中20亩用于建设,35亩用于绿化,不仅可以给郑州市西南城区增添现代气息,又可以让市民和游人在此休闲观光郑州西南板块的生态、自然美景。同时,充分利用地下空间,在此修建一个大型地下停车场,有效缓解郑州市区人口停车难的问题。

“站在三环向北看,高楼大厦一片片,站在三环向南看,一下回到贫困县。”这是坊间流传的一个顺口溜。郑州以三环为界,北三环、东三环早已形成了成熟的城市体,西三环这两年才开始发力,只有西南部的三环以外还是一片沉寂。随着郑州市殡仪馆的整体搬迁,郑州西南部城市将迎来发展黄金机遇期,西南部城区的投资建设高潮即将到来,郑州市城区经济均衡发展的构想将会得到更好的实现。



项目工作组成员热情服务,耐心讲解政策,赢得群众支持。

新闻时评

编辑 陈培营 杨怀锁 电话 67655289 E-mail:cnym@163.com

农民工幸福感要素的变与不变

广东省广州市总工会近日发布了《广州市农民工幸福感调研报告》,这份调研报告的一大意外发现是,影响农民工幸福感的第一要素不再是传统的经济因素,而是夫妻团聚等家庭因素。专家建议,在“夫妻团聚比赚钱更重要”的幸福观下,政府、社会和企业应共同努力,为农民工家庭团聚创造条件,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6月7日《燕赵都市报》)

农民工苦,农民工也苦。他们在家难,出门打工亦难。这些都算不上是什么人的意外发现。幸福是种好的感觉,但在通常情况下,农民工离幸福很远。《调研报告》称,家庭因素排在农民工幸福感的第一位,反映了本土社会仍然是一个家庭本位社会,家庭是农民工的出发点和归宿,是他们背井离乡出来工作的最重要动力。可冰冷的现实却是,多数农民工的家庭所呈现的都是离散状,天各一方,使得家人很难团聚。一家人在一起是种奢望,只有春节期间短暂的日子,才能共享天伦之乐。

正常的家庭是什么,无非就是父母和孩子风雨相依。现代人的家庭,就是在父母加孩子这样的模式下被不断地复制着。且幸福的家庭往往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社会学专家波普诺说,家庭的职能是这样一些东西:社会化、恋爱感情、伴侣关系,以及事关社会福祉的经济协作。家庭在许多方面都最适合社会化工作。它是一个小型的亲密群体,父母往往是积极主动的。在现代社会中,家庭对父母和子女都是主要的感情和伴侣关系的源泉。农民工家庭,多数属于不幸的标本。留守儿童现象,不仅是家庭之痛,也是社会之痛。父爱母爱的缺失,不仅有害于孩子的身体、智力和感情的成长和发展,还有害于孩子的社会发展。

社会化过程开始于家庭,但是,由于许多新生代农民工伴侣关系无从开始,家庭的社会化过程也就失去了前提,他们无法完成家庭的社会化任务。《调研报告》显示,近四成新生代农民工没有伴侣或者恋人。在农民工集聚的地方,由于男女比例不协调,很多人在婚恋方面遇到了巨大的障碍。伴侣关系都不能产生,谈论幸福感犹如指山卖磨。新生代农民工离开家乡,无疑要减弱与其他家庭成员之间的联系,漂泊感、缺乏归属感成为生活的常态。感情和伴侣关系是现代家庭的最基本职能,处在情感困境中的新生代农民工尤其需要感情和伴侣关系。没有这种感情依附,农民工的幸福感便是一种无源之水。

《调研报告》还显示,农民工经过十多年进城务工的积累,夫妻团聚、家人支持等家庭因素必然被放置到比较重要的位置。这表明经济社会发展到今天,很多农民工虽然还没有完全解决生存需求问题,但他们的情感诉求却在渐次递进,家庭化迁徙就是这一思想变化催生的新现象。一个农民工家庭背负沉重生活压力,在城市中生活,该有多么艰难,局外人因不能感同身受,恐很难了解很难理解。这究竟要成为几代人的宿命,现实一时也不会给出答案。 今语

玩文化即是毁损价值观和意义体系

2008年,成都市锦江区投资数千万元建成了面积近万平方米的大慈寺历史文化街区,然而,在建成后的三年时间里,这片仿古建筑几乎没有使用过,却于今年三四月被拆除。被拆的原因是“建起来以后市里不满意”。(6月14日《新京报》)

满意是什么?无非是此一事彼一事符合自己的心意,不满意就是不符合自己的心意。不满意这种心理活动,只有在特别的情形下才会有特别的意味,或者出现意外。在施政者的权力意志下,不满意的功能外溢,便会演变为意想不到的事件。不满意了还行?不满意不得了,不满意了不得。近万平方米的历史文化街区,因为“市里不满意”,说拆就拆了。一大片建筑,不是几间小房子,在规划论证之时,“市里”为何没有不满意,为何不吭一声,等到“区里”将生米做成熟饭,“市里”才不满意?而且,这个“市里”又是个什么概念?是一个人两个人,还是一帮人?

国内怎么搞城市建设的,外行人一般不清楚,但查一下资料还是大体上能弄明白的。国外城市总体规划和一些重大项目的规划虽由市长签署,但之前有一道必经的程序,那就是代议机构的讨论表决。就是说,依法理而言,制定城市规划其实是一种立法行为,公众的满意不满意很重要很管事,规划制定需要经过科学的论证和充分的博弈,一旦制定以后,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更改。但国内的城市规划,很少经过公共讨论,让各方的利益充分表达,可以说,对于城市的规划具有最高发言权的公众意见,即公众的满意不满意无足轻重。施政者的审美倾向决定着城市建设的审美倾向,建好建坏要看个人文化的表达能力。

不知有多少文化含量的历史文化街区,其命运诡谲难测。短命的仿古建筑的

玩文化即是毁损价值观和意义体系

所以短命,其背后除了存在权力的博弈,利益的博弈,还潜藏着其他方面的博弈。近些年来,文化是副牌,人人都想玩。玩文化,也成为一种权力表达的方式。可文化不是被玩的东西,文化就是文化。在社会学的解释里,文化是由一个社会或一些人共同承认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包括使这些价值观和意义具体化的物质实体。可以说,任何一个社会和群体中的人们都对好与坏有共同的认识。投资数千万元的历史文化街区,想建就建,说拆就拆,其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其好与坏的价值判断,当不言而喻。玩文化不能是这么个玩法,它不仅不好玩,会把物质实体形态的文化玩得灰飞烟灭,还会把一个社会所共同承认的价值观和意义体系玩得面目全非;它不仅会把城市所具有的个性和魅力玩成千篇一律、丑陋不堪,还把诗意栖居玩得无处寻找,还会把一个城市人们既有的未来的生存福分和文化福分彻底给玩没了。 伊文

建立“记者黑名单”的权力傲慢

卫生部新闻中心主任毛群安表示,正在打造一个健康的媒体报道平台,对极个别的媒体记者建立黑名单,以此打击他们有意误导人民,传播一些错误的信息的势头。毛群安称有关食品安全的报道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给国家的食品工业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近段时间,各类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经媒体报道后,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急剧下降。或许正因如此,就有一种声音认为:新闻报道是双刃剑,从积极的一面来看,新闻报道可以满足公众的知情权,可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过多的食品安全问题新闻报道,又会造成社会恐慌心态,产生负面的放大效应。毫无疑问,卫生部官方的此番表态几乎就是上述“逻辑”的翻版,建立所谓的“记者黑名单”——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排斥舆论监督的心态体现,折射出强烈的权力傲慢。

媒体该不该报道食品安全问题?大概不需要争论。而媒体记者毕竟不是“检察官”或者“侦查员”,在涉及食品安全的新闻报道中出现某种细节性的“偏差”,应该宽容理性看待。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有个别媒体记者居心叵测有意误导公众,但这种缺乏职业道德的无良记者终究是少数,能以偏概全、因噎废食吗?

事实上,发生食品安全问题,媒体跟进报道合情合理合法,保障了公共的知情权。此类报道多是因为食品安全问题多,如果发生了食品安全事件,媒体对此置若罔闻保持沉默,那才是需要担心的问题。没有监督,话语权也可能被滥用。这话没有什么错,不管任何权力,只要失去监督,就存在滥用的可能,新闻监督权力自然也不例外。可建立“记者黑名单”的权力傲慢告诉我们,媒体监督目前最大的问题不是话语权滥用而是频频被行政权力管制。通过法律制度跟进保护和保障媒体监督更大的自由度,比“监督”媒体重要得多。不能因为假新闻的出现,就怀疑和否定媒体监督整体的价值。回过头来想一想,各类媒体无处不在的暗访和曝光,揭露了多少深层次的安全食品根源?为公共食品安全管理者提供了多少决策和管理依据?如今,媒体监督已经成为公共监督的中流砥柱,尤其是在食品安全领域。瑞典斯科耐省警察局地方刑事犯罪局局长亨里克曾经说了一句很经典的话:“媒体的报道有时会案件的侦查产生负面影响,但我们不该为此限制媒体报道,因为媒体自身的价值高于某个具体案件侦破的价值,它带来的好处终究大于负面影响。”

当然,卫生部建立“记者黑名单”的做法更像是一种警告的姿态,很难落到实处,但其背后的管理心态有悖于权力伦理和社会文明,非常危险。 陈一舟



美酒哪有自由好

据报道,被关了整整1个月,刘某走出了看守所。他因危险驾驶罪被北京丰台法院判处拘役1个月,既是今年“醉驾入刑”新规实施后,北京判罚最轻的案例,也是首个获释的人。刘某坦言,失去自由不好受。相信这番话完全是肺腑之言。也许,我们习惯了自由,却不觉得它有多么珍贵。但是刘某这一回的特别经历,却让他扎扎实实地认识到了一个人拥有自由,原来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你活着就必须遵循一定的社会规则,尤其是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吴之如 文/画

什么车走在路上最逍遥

本周一《广州日报》消息说,广州环保NGO“拜客·广州”发布了《广州自行车出行制约因素及改善建议》,仅有15%的广州人在使用单车,其中以月收入2500元以下的居民为主,将单车作为工作用途者不足17%。而同日《新京报》消息说,深圳规定从6月6日到12月5日,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有网友提出,四部门年初下发通知,对电动自行车行业的政策要求是引导而非简单禁止。

一个历史上的自行车王国,集体抛弃了自行车,在超级拥堵与超高价价的郁闷中一路狂奔。NGO的调查结果,是“公众不愿意骑车出门有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目前大众认为骑车是落后穷困的象征,私家车和高档汽车才有面子”。顺着这个结果,我们当然需要给公众上课,比如畅想一下绿色生活、谈地球责任。但如果将这个结果作为追溯原因的抓手,恐怕就不会如此单纯而快乐。

自行车在城市生活中的卑微弱势,是伴随着城市化的风光而来的。自行车的昨天,就是电动车的今天;自行车的今天,也就是电动车的明天。尽管几乎没有一个城市以公告、政策的嘴脸鄙夷自行车的寒酸,但路政设计的取舍还是很有倾向性的,试问一条马路上还有多少自行车车道?至于今天的电动车,禁令直指安全问题。2011年3月,公安部、工信部、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四部委下发了一道通知:要求限期淘汰在用“超标”电动自行车。但判定是否“超标”的标准,仍是12年前出台的已被公认过时的电动自行车老国标。更令人怀疑的是,提及超标车的标准,媒体引用最多的是央视近日报道,譬如2009年,电动车事故造成人员伤亡数约3600余人,较之2004年增加了约6倍——这一数字乍看很是惊人,然而,“从2004年到2009年,中国电动自行车销售近1亿辆”。车的数量增加了18倍,而死亡人数为6倍,这究竟是危险增大还是安全提升?

城市不爱自行车,不爱自行车的电动车,可在需要领导作秀时“描眉画眼”的自行车,在名商富贵的健身房里的自行车,哪一辆不是公共政策的大爱?电动车也是这个道理——如果不是因为拥挤的电动车令管理者大伤脑筋,谁会自我分裂地一边说环保低碳一边恨之不亡?

自行车之死,死在无路可走;电动车将亡,很可能死在政策歧路上——殊途,而同归。至于路权或程序正义云云,徒具争论的意义。据说哥本哈根早在1995年就推出了“城市自行车”的自行车短期租赁计划,而法国巴黎市政府在2007年夏天也引进了一项“自行车城市”方案,当年年底就有2.06万辆自行车散布在巴黎市内新建的1450个自行车租赁站;就在前两天,英国前任驻俄罗斯大使撰文表示,俄总统梅德韦杰夫与总理普京还在公园进行自行车比赛……

什么车走在路上最逍遥?这不仅仅关乎诗意、权贵,还关乎我们对公平与正义的思考。因为车与路的关系,说到底还是人与资源的关系。 邓海建